

何天明
著



中国北方 草原文化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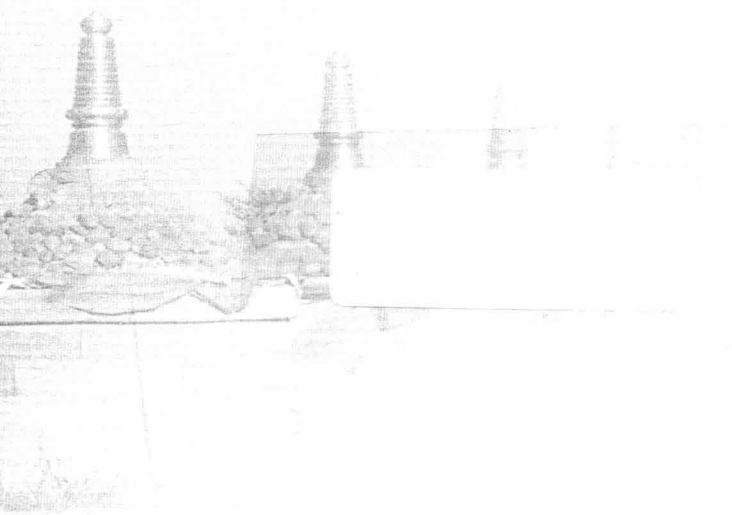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何天明 著

中国北方 草原古文化祭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方草原古文化祭/何天明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665 - 0067 - 0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文化史—中国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4858 号

书 名	中国北方草原古文化祭
著 者	何天明
责任编辑	赵 英 张华峰
封面设计	张燕红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010010)
发 行	内 蒙 古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欣欣彩虹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20 千
版 期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5 - 0067 - 0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当天明兄再次捧来一摞厚厚的书稿,嘱我写序时,内心感慨良多。还是2004年,我在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他来社里出版了《辽代政权机构史稿》。这部书凝结了他二十年对辽史研究的心得和感悟,很有新意、很有见地。出版后,原以为学术专著销路不会太好,可谁知首印一千册却很快销售告罄,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并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奖二等奖。而后,2007年他又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大契丹国》,与此同时参与了北方草原文化史、土默特史及内蒙古历史地理等项目的研究,发表了不少颇有创新的论文。现今又将出版三十余万字的《中国北方草原古文化祭》,目睹天明兄一步步走来,一是为之汗颜,深感自愧不如。似他那样执着刻苦,几十年甘心坐冷板凳,痴心于“爬格子”,于我真是难以望其项背。其二是为之欣喜,历久的艰辛耕耘,终于厚积薄发,到了收获的时节,采下累累硕果,可喜可贺。三是为之感动,在举家迁往北京后,他只身留在内蒙,潜心钻研学术,像一头老黄牛,矢志不渝地耕作在北方民族史这块土地上,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顽强拼搏的毅力和对事业孜孜追求的执着,实在令人钦佩,从他身上又一次体味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古语的真谛。

当代著名画家周韶华在完成以仰韶文化和唐代佛教文化风韵为内容的两幅画作后曾说,要用大气绘出历史的美景,留给后人去体会和思考。在已逝的漫长岁月中,北方草原上各民族曾经用他们的磅礴大气战胜了历史上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给我们留下了深厚多彩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天明兄的这本书就是反映了这样的大气之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的思维方法,对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发生发展规律,对其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及其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 and 作用,都作出了全方位的由表及里的分析,明确地勾勒了古代北方草原文化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脉络及其对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聚合、充实、发展的重要价值。我们说,看待历史文化要立得牢、站得高、看得远。立得牢,就是要站在

序





丰饶的具体史实的土壤上对历史微观世界有透彻了解;站得高、看得远就是要用发展运动的观点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本身诸种因素的相互联系中去探寻历史的发展规律。

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北方民族草原文化不再是低于中原农耕文化的野蛮落后的形态,而是与草原生态环境相契合的自然生成的文明。这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长江、黄河并列的文明形态。几千年来,农耕与游牧文化冲击、碰撞、交往、融合,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博大体系。草原文化以它的浑然大气、积极进取、开放包容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活力。

科学的思维路线,严谨的思想方法,是天明兄取得如此积极成果的重要原因,也是本书表现出的一个特色。鉴此,我热情地向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推荐本书,并祝愿天明兄继续努力,在未来的研究领域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石 斌

2011年8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编 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0
一、北方草原文化区构架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	30
(一) 自然地理学上的区域差异是历史文化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31
(二) 经济类型和经济成果是构成文化区域特色的各种人文条件的基础	32
(三) 多次发生在历史时空中的民族大迁徙和政治统治权力的扩张与更替,推动了北方草原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整合	33
(四) 特质与特色——区域文化的差异性的形成过程是文化区域形成的最显著、最生动的标识	35
二、连续性与阶段性——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运动规律	37
(一) 历史分期依据的普遍性内涵	38
(二)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的特殊性	41
(三) 对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的具体设想	46
三、古代北方草原政治文明及政治体制的特点	55
(一) 职能完善的政治体制和政权机构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56
(二) 北方草原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及最初完成政治体制和政权建设的实体	59
(三) 北方草原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及其特殊性	62
四、北方草原游牧业经济的发展轨迹与基本经验——人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伟大成就	69





(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胜利果实	70
(二)在大传承小曲折中发展	73
(三)历史的厚赠	78
五、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与传承	82
(一)从原始农业到畜牧、渔猎多种经济并存	83
(二)游牧业地位的上升与传承	85
(三)东北、西北等地区的畜牧业发展	93
六、农牧结合——中国古代北方草原农业的显著特点	96
(一)面广线长	99
(二)历史悠久	101
(三)多民族性	103
(四)特色农技	104
(五)农牧结合	107
七、与生产力及文明同步发展——中国古代北方民族	
城市建设的轨迹	112
(一)城市的起源与诞生条件	113
(二)城市的形成、发展与人类生产力及文明进步相伴随	
.....	117
(三)生产力与文明发展对城市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120
(四)生产力与文明发展程度对城市内部结构和功能变化的	
作用	126
八、北方草原文化交融现象的必然发生与历史作用	132
(一)对北方草原文化交融历史存在的宏观认识	133
(二)各项交融的内在联系	138
(三)在交融与创新中演变的大聚合	147
九、北方草原——中国古代草原文化的集成区	160
十、北方草原文化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基本规律	
——中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由自在到自觉的运动轨迹 ..	172
(一)“不平衡性”是不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173
(二)“从多元走向一元,从一元又走向多元”是不是	
中华文化发展的又一基本规律	176

(三)从北方草原文化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基本规律	
透视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182
第二编 匈奴、鲜卑、契丹政治文明考	191
一、对匈奴创建政权若干问题的探讨——匈奴政权始自冒顿	
单于说质疑	191
(一)头曼单于时期匈奴已经建立政权	191
(二)单于庭、龙城与蹄林	196
二、从东胡到鲜卑檀石槐政权	200
(一)东胡时代是否已经建立政权	201
(二)檀石槐政权	203
三、辽代南面京官探讨	208
(一)“南面京官”的设置	210
(二)辽代“特置”的与经济有关的京官	212
(三)辽代的“京学”官和上京城隍使司	218
四、辽代南面地方官再探——关于南面方州官	220
五、辽代投下州若干问题探讨	226
(一)与“头下”来源相关的问题	228
(二)“头下州”与“头下军州”及其职官任命	231
六、兴建城市是契丹族统治地区生产力和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	
.....	235
(一)辽上京兴建以前契丹族产生城市观念的原因及	
最初实践	235
(二)以“因俗而治”统治方针为宗旨的辽上京	239
(三)以京城为中心的州县体系	242
七、内蒙古辽塔——辽代佛教文化的价值信息	246
(一)辽塔勃兴的时代背景	246
(二)内蒙古辽塔述要	249
(三)辽塔遗存的价值信息	261
第三编 加速现代草原文化建设	267
一、在建设现代文化中传承古代草原文明	267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树立文化建设战略意识	277





(一) 结合历史与现实认识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	279
(二) 以实际出发认识文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	281
(三) 文化的时代性特色与文化创新	285
(四) 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要求	288
后记	291

绪 论

创新·交融·聚合：

北方草原文化之理性运动

——对本书研究课题的总体思考

文化是人类在与自然界互动的生产实践、生活实践、社会实践中收获的反映在社会最高层次上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由于任何地区的人们都需要在本地区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才能维持生存和社会发展,而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又存在差异,所以,生息其中的人群的生产形态、生活形态以及它们的质量也有明显的个性差异。这种基础性的差异经过长期锤炼与升华最终反映在文化上,使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地域上和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民族间的差异,在地理空间里分解为一个个地区性、民族性迥异的文化区。文化的这种区域的差异性,使我们要从整体上了解世界文化、国家文化、民族文化,都要将研究区域文化作为起点,然后才能对文化及各种文化间的区别与关联性进行综合研究,取得整体认识。

中国文化就是众多地区性、民族性迥异的地区文化的多元一体,即“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因此,要全面、透彻地了解中国文化,首先就要对组成这个“一体”的各个部分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术界相继启动的对长江流域文化史、黄河流域文化史以及北方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便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巨大工程。经过全国学术界同仁的艰苦努力,这一工程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由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和《黄河文化史》,张碧波与董国尧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以及李孝聪所著《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等大量专题性著作。

绪
论
创
新
·
交
融
·
聚
合
:
北
方
草
原
文
化
之
理
性
运
动





近几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也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关于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历史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不同的是,这一研究在地理空间、社会历史时段以及中心主题等方面始终以区域为范围对北方民族历史文化及其发展情势进行综合研究,这使它与《长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共同以区域文化书写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文化发展史。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在继续研究我国地区文化及文化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分析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提高对各地区文化、文化历史的本质及它们相互间的关联性的认识,以更全面更细致地汲取历史文化的精髓,发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本册各文记录了近几年来我对北方草原文化历史及其同中国其他地区文化的关联性的一些思考,研究的重点是北方草原文化的整体特点及其生成、发展的规律性。现在看来,这一研究工作尚需在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在认识上进一步提高,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为了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取得集思广益之利,特将在研究中经常遇到和思考的几个问题诉求于读者和学界诸君。

—

研究北方草原文化历史首先必须明确它同长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一样也是一部区域文化史;必须明确认识区域的属性及特定区域的环境或生存条件、发展变化情况等是对区域文化的性质、特点、地位有基础性作用的诸因素。因此,确定认识形成区域、区域文化的基础性原则便成为研究区域文化史的第一的和第一个课题。

李孝聪先生认为,区域是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 or 整体性的“地理空间的一种分化”,包含着若干个在空间上相互配合形成一定层次性和差异性的“具体的地方”。但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的影响,这些“具体的地方”又可能依据不同属性划分为行政区、经济区、文化区、农业类型区等不同类型的区域,而这些“不同类型(区域)的区界一般不重合,但也有可能相重合”^①。在这里李孝聪从五个方面对区域作出了抽象:任何区域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任何“具体的地方”都是

^① 李孝聪著《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3页。

地理空间整体中的一个“层次”或部分；任何“层次”或部分都与其他“层次”或部分存在差异；任何存在“差异”的“层次”或部分之间都存在“相互配合”的关联性；任何与其他“层次”或部分存在关联性的区域都可依据人类社会活动属性的不同，即依据人文要素将其划分为行政区、文化区等不同类型的区域，而这种区域的区界相对于纯自然地理的区界具有相对的灵活性。李孝聪提出的对区域的认识和区域划分原则在大概率上和北方草原历史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情况是一致的。

北方草原文化同长江文化、黄河文化都是在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大系统中并列的最高“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发展史都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文化史中的区域文化史。这三大文化区的整体差异是长江文化区属稻作经济文化区，黄河文化区属粟作经济文化区，两者虽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具体差异，但都是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文化区，而北方草原文化区却是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特色与文化特色的文化区。另一方面，这几大文化区之间于存在差异的同时，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也存在相互配合的“关联性”。特别是北方草原文化区与黄河文化区由于山水相连及农牧业生产对两区域内各族群人们的生活的互补性，它们互为对方发展的重要环境和外部条件，“关联性”尤为紧密。就如我在《北方草原文化区构架的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一文中所说，由于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农牧结合民族生息、往来于这两个地区，特别是它们长期在接壤地带交换和交流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致使在这两个区域衔接处还存在一个密切接触带或农牧文化交混地带。这些地带的文化、文化发展史是黄河文化史和北方草原文化史研究都必定要关注的。而且，这个地带的这一特殊性还为区域界线的划分带来了“一般不重合，但也有可能相重合”的矛盾——作为自然地理区域在两个区域之间应划出精确的区界；而由于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特性，作为文化区又很难划出精确的区界。面对这一矛盾，我们应如何确定北方草原文化区的区界呢？我认为应当采取既要尊重自然地理走向又要尊重文化区的特殊性的态度，以自然要素为基础，以人文要素为前提，采取灵活的处理方式。我们在北方草原文化史研究中，把北方草原文化区的区界“大体上界定为以现今中国境内从大兴安岭以东、以西、以南地区经燕山、太行山北部、内蒙古高原到昆仑山、阿尔金山、阿尼玛卿山、秦岭以北和以东地区”，同时又将“山西、河北、天津北部等地区地势同北方草原地区紧密相连在古代也作为北方游牧民族活动区”的地带，同时将





与所界定地区沿黄地带的同类地区一起视为北方草原文化区的“软边界地带”。这个界定就是综合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运用既以现实为依据又照顾历史实际的原则作出的。这一界定的灵活性表现在,其中与黄河文化区相重合的地带既是北方草原文化史研究不能不涉及的地带,又是黄河文化史研究不能不关注的地带,因而具有黄河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文化区的“双重身份”。在研究中,二者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对两个区域间的关联性的研究却必定会取得一致的认识。这对区域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的整体性研究都是有益和必要的。

划分区界在区域历史研究中是一项基础性工程,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如我们划定的北方草原地区西、北、东面与现今国界相重合的区界都是现今中国与各邻国的国界,这条边界外相当广大的地区在历史上都曾是中国领土或生息于北方草原上并创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各民族生产、生活和活动的地区,而且在历史上,由于北方草原各民族曾多次发生过以大漠南北蒙古高原为腹地的争雄之战和频繁地游动迁徙,这些地区还相应地发生过扩大或缩小的变化。如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弑父自立后,匈奴政权统治北方草原地区时,便曾将疆域扩展到“北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西至天山南北,东至辽东平原,南至今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北部、陕北的河套地区、黄河以南以东地区”^①;突厥汗国时,亦以漠北为中心,将汗庭建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北之都斤山地区,公元553~572年,木杆可汗在位时期,控地更“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②;公元932年,契丹辽圣宗耶律隆绪执政后,不但承接其前辽政权所控燕云、大漠南北诸地,还相继用兵靺鞨、乌古、敌烈等部,西征回鹘,东侵高丽,辽朝为金所灭后,其后裔贵族耶律大石还于1124年在位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之回鹘城(辽辖时的镇州)建可敦城,1134年又进入七河流域建立了西辽,足迹远达中亚楚河南岸,所控地区西北抵咸海北岸,南以阿姆河、喀喇昆仑山为界,西至里海,东连哈密;建立大元帝国的蒙古族是于9世纪中叶自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涌入外蒙古高原的室韦——达怛人吸收突厥、铁勒、契丹、女真、汉等族人口,至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时逐步形成的,元朝建立后于统治全中国并使中国古代版图达到历史最

① 参考[汉]班固撰《汉书》卷94《匈奴传》的史料记载,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3页。

②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5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11月,第909页。

大时,也在成吉思汗时代便已实行全面统治的东至兴安岭、南濒大戈壁、西达阿尔泰山、北至叶尼塞河的漠北地区设置了岭北行省,安置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于斯地生息繁衍……由此可见,列举的和未及列举的北方草原各民族在历史上生活的这些地区,虽然而今已不属中国,且各时期的疆域大小亦不尽一致,但这些地方也是历史上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的地理环境因素是被公认的。研究北方草原文化及其历史自然不可能不眷顾到这些地方。

应怎样解决历史给北方草原文化研究带来的这一问题?研究西北民族关系史的杨建新、马曼丽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确定和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当:(1)从当前中国的疆域出发;(2)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出发;(3)从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确定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的几条认识原则。这几条原则既肯定了现实国家疆域的法定性,也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各民族“长期生存发展的那部分地区”也是中国历史疆域的事实,同时又对历史上的疆域给予了历史性的尊重。两位学者对待研究对象所持的这一态度是科学的,思维是严谨的,所提几项原则不仅正确,而且也完全适用于北方草原区域文化研究^①。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1)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区域文化史,是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区的历史文化与文化历史,在研究工作中还要从这个区域文化滋生和发展的历史实际出发,不仅要重视现实中国北方草原各民族对创造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贡献,古代曾经是北方草原民族而今由于各种原因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或发展成为另一个新的民族的古老民族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缺失的。如匈奴、月氏、鲜卑、突厥、回鹘、柔然、党项、女真、契丹、室韦、夫余、渤海等许多民族,虽然已不见于今日中国民族名册,但在历史上却曾对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滋生、创新、交融、传承做出过巨大贡献,缺失其中任何一族的内容都会隔断历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破坏历史文化的完整性,使整个研究工作无法进行。(2)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区域文化史,是北方草原文化区的历史文化和文化历史,在疆域、区界问题上坚持杨、马二位学者提出的原则,还不能不考虑到文化比政治、经济的吸融性、扩张性更具韧性这一特点,给予对区域文化滋生、发展相关地区文化的关联性以

^① 杨、马的这些观点,参看二人所著《西北民族关系史》“序言”部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9月。





更多的关注。如在历史上,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北方草原文化都没有中断过它吸融中原文化、西亚文化、中亚文化,吸融引进了儒、释、道文化以及基督、伊斯兰等宗教文化,同时,也不断地将北方草原各民族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传输到这些地区去。这些活动有时是伴随民族战争中的攻城略地一道以强制方式进行的,但在战争后却仍然以润物无声的方式继续进行,加上无论何种文化原本都是人类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产物,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原本就有以对方文化中某些成分弥补己方不足的需求等文化源起因素和影响力方面的共性,都使我们不能不以发散思维打破区域界线的束缚去观察北方草原历史文化和文化历史发展的规律。

在这里,我们着重对区域和北方草原文化区范围、国界线的界定原则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正是在这些理论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对北方草原这块广袤土地上各族先民所创造的不仅让北方草原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也让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的文化和文化历史的认识。了解了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先民给今人留下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了解了他们创造过程的曲折与艰难,了解了这些文化的内涵之丰富与深邃,我们将更加珍惜这块土地,珍惜在这块土地上滋生、成长起来的文化,珍爱创造这些文化的各民族以及他们的先人们!

二

在研究中国地区文化史时,一般必定要涉及:地区文化发生、发展的基本轨迹;地区文化发生、发展与地域内民族文化(在多民族地区则为多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交互作用;地区内民族文化与地区政治、经济的关系;地区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突出特点;地区文化同中华文化的关系及其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地区古代文化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影响。这几个问题都是认识地区文化本质必须解决的。透彻了解它们就可以找到地区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准确认识地区文化及其发展形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因此,研究北方草原文化及北方草原文化史,也理所当然地要对这几个问题给予重点关注。现在,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不少研究者已将注意力集中在对

北方草原文化价值和价值观的研究上。这是北方草原文化区历史文化与文化历史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它引起了我们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进一步思考。

这里所说的价值与价值观并非经济理论领域中的商品价值及对商品价值的理性认识。价值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①,是该事物与生俱来的效能表现形态,是事物主观物质属性的延伸;价值观是指对这种“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的认识或理念,是人类站在客观角度上对该事物价值的认识、评价和追求,属社会观念形态范畴。价值与价值观的关系是:价值是价值观产生的物质基础;价值观是生成于价值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因此,当价值观能正确反映价值作用原理时,就会同价值在内容品质上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反之则会在质或量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或背离。从事物的价值到价值观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反映过程,即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过程的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一旦完成,就会开始从精神到物质的第二次飞跃。这第二次飞跃过程的价值表现是,价值观一旦形成,还要反过来去指导价值质量的提升,并同时接受新的价值作用的检验。价值与价值观的不同属性告诉我们,价值因只是“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的客观反映,故只有大小高低之别,而无正误端谬之分。但价值观则不然,因其系人们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用途或作用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经过人们头脑改造后的产物,会因人们智力高低的差别,思维方法的差别,掌握材料或数据多寡真假的差别,以及各人或各人群所受时代物质生活及认识水平的局限,而呈现出正确或错误、全面或片面、运动或静止、积极或消极的差异。这种情况决定了科学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往往要在实践中经历正确与错误、全面与片面、运动与静止、积极与消极的反复较量,才能在不断地修正谬误以后完成。如北方草原文化区中游牧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所持的“天人合一”观念,最初由萨满教巫觋们所作的将大自然极大神化的解释,其认识路线无疑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的人要尊重“天”的观念却有利于各游牧民族创造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游牧生产方式,因此,在他们的解释中同时也包含了积极的唯物主义成分。到现代,经过几千年生产实践和认识实践,这里的人们对游牧方式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畜牧业发展同草场的质与量的矛盾已经有了完全的唯物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第一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9月,1981年4月第3次印刷,第504页。





主义认识,已经自觉地大规模地展开了维护草原生态平衡、提高草原质量的行动。北方草原上的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个认识过程,也从实践层面上说明了事物的价值并非千古不变,人们的观念也是随之由低级向高级、由片面向全面、由主观向客观发展的。

近几年来,在北方草原文化研究中,核心价值观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其中有一部分是在未对北方草原文化价值或价值观做整体研究或全面分析的情况下提出的。这反映了有关研究人员欲深入认识这一文化价值的急切心情,但由于在实践中缺乏整体研究和全面分析,却常常会给课题的答案带来片面或偏颇。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全面地认识价值、价值观同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相互间的联结状况,给它们以符合实际的科学的定位。

在物理学中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原理,认为表示质量的 M 可以转化为表示能量的 E ,但由于不同物体的 M 密度的差别,各个 E 的力度并不相同, M 密度越强, E 的力度愈大,反之,则 E 的力度也会随之变弱。 M 与 E 的这种正比关系告诉我们,在对任何事物价值进行研究时都要注重被作用事项的 M 密度同发挥作用事物的 M 密度的对应关系,只有在二者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下,作用方事物才会发挥出与被作用方事项需要相适应的能量;如果要使作用方事物能发挥更大能量,对被作用方事项的成长发展起更大作用,就要努力去提高作用方的质量密度。另一方面,这一对应关系还告诉我们,无论在历史抑或现实的人类社会中,被作用事项和对这个事项发挥作用的事物都是有大与小、轻与重、简与繁的区别的,只有那些质量密度较大的事物才能产生与规模较大、结构较复杂、影响面较广的被作用事项基本对应的或更大的能量,在价值或价值观方面才会有核心与非核心的区别,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分别是价值整体或价值观整体中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情形就如同一把琵琶,在无伴奏表演中,只是一件个体弹拨乐器,是无所谓核心或非核心的,只有当其进行由多种乐器伴奏演出独奏曲时才是整个乐队的核心一样。因此,人们要判断它是否为核心乐器,就必须对整个演出的阵容和它在这个阵容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在北方草原,其文化的价值与核心价值、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相互间的联结关系也情同此理,要准确地认识它们的核心部分及这些核心部分的地位和作用,还需要下功夫研究它们的结构和结构中各部分相互间的内在关联性。

在社会事物中,所谓 M 密度的大小所指就是事物的构成和内在品